

开发与寺庙发展之关系——以新竹县为中心》，盛业信发表了论文《从台湾王爷信仰的演变与发展试谈台湾民间宗教关怀与现代生活之关系：以南鲲鯓代天府为例》。

萧登福宣读了论文《从道教的生命观看道教的人文关怀》，江达智发表了论文《〈太平经〉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刘焕玲发表了论文《全真教祖王重阳的真功真行》，林安梧发表了论文《‘新道家’与‘治疗学’：论‘根源的回归’与‘存有的照亮’》，他以傅兰克的意义治疗学为视角来观照中国的儒、释、道、民间信仰等，从中发掘出对现代人极具意义的精神价值，颇具启发意义。邝芷人发表了论文《‘太一崇拜’与‘三清信仰’及其本体论意义》，他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以西方的本体论来观照中国道教的教义有一定的新意。刘文星发表了论文《周安士对儒释思想的比较与会通：以〈阴鹭文广义节录〉为例》。

全体与会者在一种亲切、自然、轻松的气氛中互相交流关于宗教关怀与现代生活的研究心得与体会，论文涉及儒、释、道、耶、伊斯兰教、民间信仰等各种宗教与信仰；研究方法多样，有哲学的、文献学的、艺术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不一而足；研究对象的层次繁多，有关于一部经典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国家，乃至全球与整个宇宙的。总之与会者畅所欲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增进友谊。总体而言，大陆学者更倾向于历史的研究，其研究与现实的关联度相对弱一些；台湾学者侧重于宗教在现代社会之功能与作用的研究，尤其重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多采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方法。

12月25日中午研讨会结束，大陆学者启程赴台北。途中经过位于南投县埔里镇的中台禅寺。惟觉法师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张新鹰团长和惟觉法师互赠了礼品。张新鹰和杨建国向惟觉法师谈到中台禅寺派往宗教所攻读硕士学位的两位法师的现况，说她们表现十分优秀，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研究生院的一致称赞，并希望中台禅寺与宗教所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能继续下去，通过双方努力使其达到一个新水平。之后，在副住持见达法师陪同下，全团游览了中台禅寺的主体建筑。

2005年12月27日上午，大陆学者应邀前往台湾佛光山台北道场参观访问。在满耕法师的陪同下，参访团参观了佛光山台北道场的电视台、书画苑、佛教音乐制作部门，受到星云法师的欢迎，并与全体成员共进午餐。双方在亲切、坦诚的气氛中就广泛的话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代表团赴台参加学术活动，结识新朋友，重会老朋友，交流学术研究的心得与体会，收获颇丰。同时，也借此机会增加了对台湾社会现状和宗教情况的了解，又一次使我院对台工作的独特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作者李建欣，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 “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举办

铂 净

2005年12月26日，由重庆华岩寺主办的“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论坛”在重庆南方君临宾馆举行，来

自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武汉、厦门、杭州、扬州、澳门、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与佛学院的研究人员和教师，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麻天祥、谭世宝、姚卫群、吕有祥、黄夏年、李向平、段玉明、张凤雷、刘泽亮、华方田、周贵华、董群、吴平、刘元春、徐文明、陈永革、杨维中、陈坚、纪华传、刘长东、徐清祥、戒毓、法缘、李尚全、俞学明、周齐、刚晓、惟善、妙中、觉多、菅田智雄、金东淑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45篇，主要围绕佛教教育、重庆佛教和世界佛教论坛三个主题展开。

学者们从历史与现状的不同角度讨论了佛教教育，强调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就形成优良教育传统，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办佛教教育的经验，应当对此认真总结，吸收一切好的成功的方面，同时也应审时度势不断对佛教教育进行改善和充实，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当前要发挥佛教教育功能，佛教教育必须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明确佛教教育的社会定位，拓展佛教教育的社会领域。

从佛教信仰层面看，佛教教育为广大信仰者提供需要，主要是为相关的道德教育提供资源。佛教是讲究“对机施教”的，对现代大多数僧众和中国佛教的发展现状而言，要想培养现代僧才——特别是大批量地培养僧才——只能实行佛教教育的正规化、规范化措施。只要遵循1992年“上海会议”和2005年“峨眉山会议”所确立的“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办学方针，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按照丛林僧人的要求对学僧进行严格管理，学僧就不会信仰淡化、戒律松弛，保证佛教教育的成功。此外，佛教教育不应局限于僧教育的范畴，因为它牵涉到社会的和谐有序。

佛教教育需要进行综合分层，针对具体的教育目标提供相应的教育内容，建立“资源共享”、“分工合作”的教育协作机制，以保证佛教教育的有效进行。佛教教育要既保持佛教之本位与主体性，又要强化对佛教信众在信仰的情感方面的培养，使他们具有坚定的佛教信仰，因此必须寻找有效的方式强化佛教信仰教育，培养、激发、强化学僧或信众对佛教的感情。提高僧伽的素质、德养，透过有计划的僧伽教育——研习教理，树立纯正信仰；修习止观，长养智慧，成就僧格；参与寺务，承担如来家业，培养具备奉献精神、恢弘气势、弘法智慧等德才兼备、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宗教师，这是佛教僧教育培养的真实目标。也有人认为，佛教的僧教育不应该跟着社会教育亦步亦趋。汉传佛学院的僧教育要继承佛教优良的教育传统，以提升僧伽的素质为根本，全面培养学僧的修证、管理、弘法、学术研究等多方面的能力，并以设立养成僧格教育的律仪院和专宗研修院的形式作为补充，吸收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现代文明的种种成果，培养成就一批学修并进的新时代的僧才。佛教教育必须要回归到佛教核心的思想缘起法则上，学僧对佛陀的核心思想的研究和学习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佛教教育关键所在。

学者指出，学僧教育里面，成佛教育是一个重点。面对近代以来的历史巨变，以寺院为基地的传统僧才教育体系已明显不适应于新僧才的培养要求，这就要求新僧才培养以僧教育为本、俗教育为枝，两面开展，兼收并蓄，庶可使佛教更真地、更深地契入当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对佛学院教育，一、理清办学理念 and 性质；二、改变管理体制和教学模式；三、建立稳定的教师队伍；四、发展多元化佛教教育；五、成立佛教教育基金会；六、毕业生去向的合理安排。僧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佛教职业教育，它的办学方针应该锁定为“一有二爱三懂”，即佛教信仰第一，社会文化知识第二，懂佛教教理第三。在目前僧教育的体制上，加强丛林教育的基础上，引进现代教育机制，以弥补当前僧教育出现的种种弊端。而世俗大学的佛学教育则必须把握好“度”，应避免宗教色彩太浓（宗教学专业除

外),本着佛教“方便”精神,从文化和哲学层面开展佛学教育。

代表们对历代佛教祖师教育思想也做了探讨,认为六祖慧能《坛经》所表达的教学精神是非常平实而稳健的,慧能教育、开示和启发学人时多是结合经教教理,同时又不让人对经教教理陷入知见执著,而是处处破除执著,让人领悟真谛。明清之际重庆华岩寺德玉禅师所著《禅林宝训顺珠》作为当时僧伽教育的教材,力斥四种禅弊,倡导禅儒道圆融之旨。在主旨上尤其提倡长老、住持就是道德的体现,学道僧人要以诲人道德为立身之本,诚除利欲为止乱之源。这些独特的见地,不仅是禅佛教在世俗化背景下神圣性的保证,而且对于现代佛教僧伽教育亦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禅门巨匠虚云大师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生终极关怀为佛教教育目的论;“济世利民”的大乘菩萨道积极利他精神,化导世间,教化世间,以佛理净化世道人心,最终转化秽土为净土,转烦恼为菩提,转习气薰染的凡夫为圆满诚实的圣人境界的佛教教育作用论;文字承载着真理,如标月指,主张不立文字而不离文字,“籍教悟宗”的教学原则,为中国佛教教育提供一个成功的参照。欧阳竟无居士的支那内学院成功经验有三条:一是佛教教育必须采取现代大学的学校制度。二是佛教教育必须有一代豪杰之士的参与。三是佛教教育必须有生养豪杰之士的学术资源、思想资源和经济资源。当代我国僧人到外国留学,已经不仅仅是佛教教育的自主选择,更是一种配合国家的“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发展战略,是国家改革开放海纳百川的现实需要。

有关重庆佛教的文章,本次会议仅有为数的几篇。学者指出,重庆佛教的历史线索是清晰的,唐代重庆是与中原佛教,特别是荆楚佛教相联系的重要桥梁,宋代重庆佛教主要体现在大足石刻方面。明清以后的重庆佛教有了重要的发展。民国重庆的佛教则在中国佛教史上居重要地位。重庆佛教的研究不是资料的匮乏,而是缺少收集与整理,缺少专门研究的人才。有学者指出,明初无际禅师参访古拙俊一定是在永乐四年底或永乐五年初,地点一定在安徽繁昌。永乐五年,古拙俊奉旨至南京时,无际禅师可能未必随行,他于此年回到了四川。永乐年间无际被征召至京师南京登坛说戒,并且被赐“大善知识”德号是可能的。无际禅师跟从“幽谷和尚”习禅而有所感通,接受了清禅师所传的看话禅,而其最终师承的是古拙俊所传的断桥妙伦法系。断桥禅系从无际禅师之后,禅风加进看话禅的参“无”字公案和“参究念佛”所代表的“禅净融会”的路向。也有学者指出,破山海明是大竹县人,其祖辈曾居住于渝城(今重庆市),但到其父时已经家道中落,移居大竹。海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开悟之后,才向憨山德清等人参学,一生住持寺院十五处。太虚大师(1890-1947)以其在重庆领导弘法抗战及在缙云山创建著名的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确立了重庆佛教在弘法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开辟了现代中国式佛教教育的通道。通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的活动,可以看出,重庆佛教界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以太虚为中心,以重庆长安寺和汉藏教理院为基地的中央系统的僧伽。二是以重庆僧人为中心,以华岩寺为基地的地方系统的僧伽。此外,还有一批以公会形式存在的居士组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弘法的活动,不仅培养了一批懂唯识学的弟子,也使唯识学研究成为川渝两地佛教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本次会议是在重庆佛教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佛教学术会议,撰写了重庆佛教历史的新篇章,意义重大。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对重庆佛教界的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必有一个强大的促动,重庆的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也将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作者铂净,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